

湯顯祖“情”治遂昌

龔重謨*

湯顯祖上疏遭貶為徐聞典史，但導致貪腐的輔臣科臣政治生命的完結。內閣改組了，朝中政治形勢變化有利於湯顯祖，以致在徐聞僅呆了半年就“量移”遂昌知縣。湯抵任後，原在徐聞所體現的“人為貴”的“民本”思想昇華為“情”的觀念。湯以“情”施政，建遂昌為“有情之天下”的實驗地，“政聲冠兩浙”，但卻遭到地方勢力的忌恨。湯看破官場黑暗，更不忍苦心經營的“情天下”為礦監稅使所騷擾，因而憤然棄官歸里，然其於遂昌之遺愛，千秋為百姓所懷念。

引 言

湯顯祖是與莎士比亞比肩的世界戲劇大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一百名國際文化名人之一。他於1550年出生在江西臨川縣（今撫州市）文昌里的書香人家，從小就文才出眾，十四歲那年中秀才，就遇到處州人何鏜任江西學政（督學官）到撫州府主持院試。何鏜看見湯顯祖氣宇不凡，即舉書案為破題要他回答。湯顯祖想，此書案是具體的、可以捉摸到的器物，是形而下；我坐這書案授業，進行思維活動，學到了知識（道），為形而上。呵！他馬上明白過來了，這不就是《易經·系辭》提出的重要命題嗎。湯顯祖從容回答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何鏜聽了，對湯的才華感到驚奇而贊歎：“文章名世者，必子也！”何鏜是慧眼識才的伯樂。湯顯祖念念不忘這位恩師，直到去世前寫的〈負負吟〉還提到當年童子試“便為學使者處州何公鏜見異”。

湯顯祖二十一歲那年中江西鄉試第八名舉人，更才名鵲起，“海內之人益以得望見湯先生為幸”。他考進士可很不順利，一連四次名落孫山。科舉考試主要看考生闡述經義的八股文，湯顯祖當時雖是有名氣



清道光十八年（1838）江都陳作霖敬摹湯顯祖画像

* 龔重謨，畢業於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史論專業，副研究員，退休前供職於海南省文化行政與事業單位；中國戲劇協會會員。已出版專著《湯顯祖研究與輯佚》，《湯顯祖傳》（合著），主編《中國歌謠集成·海南卷》（國家藝術科研重點項目），《海南歌謠情歌集》，另有〈李觀思想核心價值探微〉、〈海南文化市場發展趨勢與管理〉等文章入編有關專題論著。

的八股文能手，可八股文是一種程式化的寫作，要“代聖賢立言”，考生祇能亦步亦趨，揣摩古人語氣，不容許表現自由思想，發表獨立見解。而湯顯祖則是主張“文章之妙，不在步趨形似之間，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合奇序〉）他作八股文往往馳騁情思，注入靈性，寫出真情，而不覺偏離八股文的規範，很可能就是這樣的原因，以致文章不合考官口味。然而後兩次的落榜卻是因拒絕首輔張居正的籠絡而遭到報復。張居正為了要使自己兒子高中，又想遮人耳目，便去籠絡才氣“名播天壤”的湯顯祖來陪考，“啖以巍甲”即暗許前三名，這樣就顯得他兒子高中是憑真才實學。但湯顯祖不買賬，甚至還說“吾不敢從處女子失身也。”直到張居正死去，湯顯祖三十四歲了才中了個低名次的三甲進士。

中進士後，新任首輔申時行也想將他招致門下，要選他去翰林院當“庶吉士”，即相當於今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研究生。這是明代培養高官的搖籃。湯顯祖選擇放棄，寧願自請到南京做太常寺博士這樣的閑官，六年後好不容易才陞了個禮部主事，便因上疏彈劾輔臣申時行和科臣楊文舉，還把矛頭指向了神宗，被神宗貶到雷州半島的徐聞縣當“典史”。半年後，由於朝中政治形勢有些變化，廉潔清政的陸光祖主政吏部，加上同年好友劉應秋等人的積極斡旋，神宗為他落實了政策，那時叫“量移”，調湯顯祖到遂昌當知縣。

以“情”施政

遂昌位於浙西南“萬山溪壑中”，東倚武義、松陽，西與江山、浦城為界，南枕“寶劍”之邦龍泉，北與衢江、龍遊、婺城相抱，峰巖秀聳，層巒疊嶂，溪澗靈動，錢（江）甌（江）之源，“土風淳美”“土民雅厚”。

遂昌對湯顯祖來說既生疏又熟悉。生疏的是這個山間小縣他從未曾登臨；熟悉的是宋代大哲學家龔原出於遂昌。龔原曾師從王安石，做過太常博士，是荊公學派的後勁，著有《周易新講義》。龔



遂昌尚存的湯顯祖之遺愛祠

對《周易》的“形而上”與“形而下”有自己的解釋，體現“天人合一”的風格，“自熙寧以來，凡學《易》者，靡不以先生為宗師”，少年時代的湯顯祖在徐良輔指導下研讀過龔原的《講義》，受益匪淺。十四歲童試時，他用“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回答督學出的破題，受到推崇，而這督學何鏜又是處州人。湯顯祖與處州地區有緣，現在竟做起了龔原故里遂昌的知縣了。

湯顯祖踏上遂昌這塊土地，就被這“世外桃源”的景致所傾倒，贊美遂昌是名不虛傳的“仙縣”，慶倖自己當上這裡的“仙令”。

湯從《遂昌縣誌》等地方文獻瞭解到，這座建縣於東漢的古邑，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人口僅有24,723丁，到隆慶二年（1568）減少到11,407丁。經過二十五年的繁衍生息，人口也不超兩萬，真可謂“斗大縣”，“在浙中最稱僻瘠”。湯顯祖下車伊始，不是坐着八抬大轎在衙役們的鳴鑼開道聲中在縣城耀武揚威，而是微服走出縣衙深入民間察

訪。呵！沒想到這千年古縣城竟連城牆都沒有。第三天他就去拜孔廟。孔廟雖“甚新”，但隨老師和學生一起去察看前任知縣鍾宇淳於萬年七年（1579）建的三間講堂，實已破舊不堪。除此，全縣再沒有其它地方有書院了。湯顯祖問有多少藏書？師生們異口同聲回答說沒有！湯還走到青雲坊的青雲亭前和一個姓蘇的老秀才聊上了，此人是永樂年間舉人蘇祥遂的裔孫，知道鄉民們既不愛禮樂文章，又不肯習騎射箭，希望官府能為百姓建射堂辦書院。在社會治安上，又因山多林密，常有虎患發生，就上任的當年，發生了老虎進城傷人事件和“殺人於市”的命案。更為嚴重的是，鄰縣來的流民中，有的是隱姓埋名的“逃犯”，他們與地方無賴之徒相互勾結，偷伐林木，私開礦藏，成為遂昌社會治安的一大隱患。

湯在官場雖混了整十年，但做的都是冷衙京官，沒有地方為政經驗，更沒有獨當一面治理過一個地方。他僅在上疏遭貶後，在徐聞當了幾個月的典史，管社會治安，得機體察社情民意，用講學論道去宣導“人為貴”，扭轉當地輕生好鬥的不良民俗。現在他獨當一面治理一縣，有機會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諸實施了。

湯顯祖對唐代社會很嚮往。他在為好友李季宣作的〈青蓮閣記〉中說：

世有有情之天下，有有法之天下。唐人受陳隋風流，君臣遊幸率以才情自勝，則可以共浴華清，從階昇娛廣寒。令白也生今之世，滔蕩零落，尚不能得一中縣而治，彼誠遇有情之天下也。今天下大致，減才情而尊吏法，故李宣低眉而在此。（《湯顯祖全集》卷三四）

湯顯祖認為唐是“有情之天下”，所以李方夔凌厲一世發揮他的才能，才有像唐明皇與楊貴妃那樣的浪漫愛情故事發生；而他所處的是嚴刑峻法壓抑人性和才情的“有法之天下”，以致有為之士俯首低眉，李白若生活在明代也不能發揮他的才能。他要做一個親民的官，要以“民為

本”，“人為貴”，尊重人的價值，尊重個體存在的權利和意志的表達。在答寧波知府吳安國的信中湯談到他的治遂理念：“僕又不善為政，因百姓所慾去留，時為陳說天性大義。百姓又皆以為可，賦成而訟希。”（〈答吳四明〉）所謂“百姓所慾”就是“飲食男女”、“七情六慾”的人之天性，湯顯祖決定以情施政，把遂昌建成“賦成而訟希（稀）”的一個“有情之天下”。

興教勸農

為把遂昌建成一個“有情之天下”，湯上任伊始就整頓衙門作風，“不煩衡決，勞撻伏”，“減科條，省期會”，即理順混亂的公務關係，揭露隱秘的壞人壞事，精簡法令條文，省掉冗雜的會議。面對“學舍、倉庾、城垣等作俱廢”、盜賊猖獗虎患橫行的遂昌，湯顯祖感到非“稍修治殆不成縣”。他一手抓文教設施建設，一手抓農耕生產，還抓地方武裝訓練。湯抓的第一個工程是興建書院。四月初一正式開始辦公，他就接到省裡學政的公文，要看學生演練射擊。學生們叫苦連天，都說從沒有練習過，連射堂都沒有。於是湯顯祖親自選擇眠牛山麓作書院建址，四月十五日開始營建射堂。五月是雨季，所需木材就借山洪爆發順利運到，六月射堂建成，八月學舍完工。學舍在通道兩旁各十五間，每間住二人，可供六十人寄宿。學舍的建成，不僅解決了書院用房不足的問題，也為家在鄉下的學子提供了寄宿就讀的方便。湯顯祖命名其為“相圃書院”，寓意為國哺育將相之材，希望書院能作為“有鵠求臣子，為侯應帝王”的“苗圃”。考慮書院以後的修繕以及對貧寒學子的資助，湯顯祖還用將原屬城隍廟和壽光寺的租田二十五畝撥給相圃書院。千年古遂昌官辦書院從此始矣，從學舍二門至大門兩側有池，池上有橋，湯顯祖常過橋到書院講學，他校釋解繹的《千家詩》供作教材，親手為學子批改文章。湯常來射堂右側的武射場，督察操練騎射。射場後面是繞城而過的南溪水，流經這裡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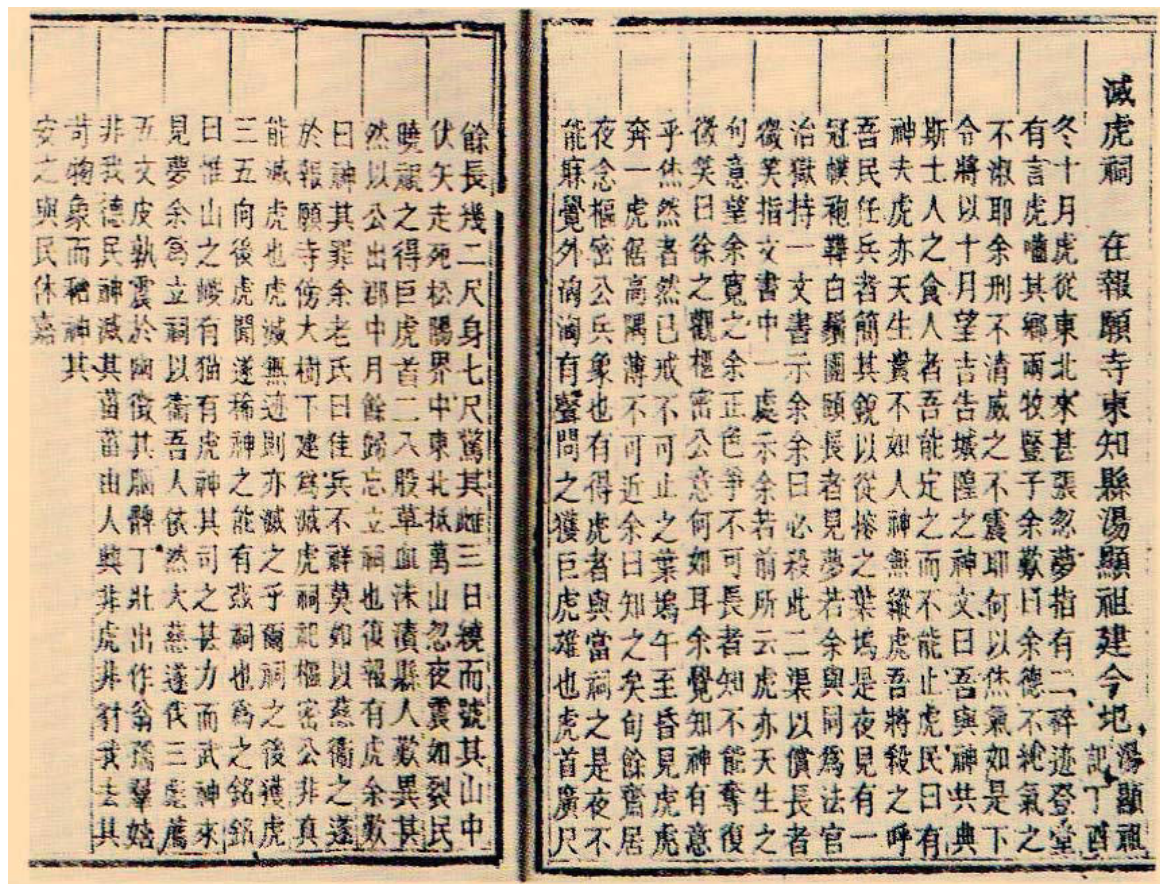
一泓清可見底的深潭，叫射後潭，潭水可飲可用。翌年又在孔廟之側明倫堂後建起“尊經閣”，令遂昌破天荒有了圖書館。他為了催人勤於耕讀一改懶散習氣，又在城東報願寺重建“啟明樓”，鐘樓上懸巨鐘擊鐘把時，鐘聲有慢十八、緊十八、十八又十八之分，催人按時作息。鐘樓建成後，湯顯祖曾親宿鐘樓上最高層擊鐘警世傳為美談。

湯顯祖到任後兩年就為遂昌興建了這麼多工程：建相圃書院的經費僅“以學租三千錢”作基本資金，湯自己帶頭捐出官俸；建房所用木材人工相當部分是從訴訟處罰中解決。這些設施的興建為遂昌發展文教事業打下了基礎，促成了民風民情的轉變。是有了書院後，習禮尚文的空氣明顯濃厚了，“至夜分，莫不英英然，言言然，講於詩書六藝之文；相與為文，機力以奇暢，大變陳常。”（〈相圃書院置田記〉）“即事便成彭澤里，何須歸去說桑

麻”。在湯的心目中，遂昌已是他的第二故鄉。

為了“有情之天下”的實施，湯還走出去借鑒外地治縣經驗。萬曆二十二年（1598）冬，湯利用進京上計（地方官三年一次的進京考核）機會，特別到山東騰縣考察。縣令趙邦清在騰縣採取了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措施，把一個“貧弱之滕縣”面貌大加改觀。趙邦清，字仲一，號乾所，甘肅正寧縣人，貧苦農家出身，萬曆二十年（1592）進士，次年任山東滕縣知縣，時年三十六歲。湯考察後和趙一同進京“上計”，他倆結下深厚友誼。

遂昌是“浙南林海”，山多田少，“九山半水半分田”，土地貧瘠，生產落後。湯顯祖深知，須解決百姓溫飽社會治安才會好轉，百姓才能安居樂業。趙邦清為拯救山東騰縣饑荒，購買耕牛和種籽分給貧窮人家，教民稼穡，傳授較先進的耕作技術，鼓勵農民開荒種地，取得了顯著成效。



清版縣志所載“滅虎祠”條目

湯顯祖根據遂昌縣情採取勸農措施，在春耕農忙時節停止派伏徵稅，日常訟事也暫緩審理，開春後即頒佈農耕政令，率領衙役帶着花酒和春鞭，送到田間地頭，舉行“班春勸農”活動。其詩〈班春二首〉，描繪的就是當年他在遂勵農的春耕圖：

今日班春也不遲，瑞牛山色雨晴時。
迎門竟帶春鞭去，更與春花插兩枝。

家家官裡給春鞭，要爾鞭牛學種田。
盛與花枝各留賞，迎頭喜勝在新年。

遂昌至今還有“打春鞭”民俗，便是“班春勸農”儀式的遺存：立春日在瑞牛山麓，放一內填五穀的紙糊春牛於供桌上，由縣衙役裝扮象徵豐收的“勾芒神”，縣官先用春鞭打牛，然後將帶去的春鞭發給大家，讓大家鞭打紙牛，紙破穀溢兆豐年，以此激勵農民精耕細作奪取豐收。《牡丹亭》第八齣〈勸農〉寫南安太守杜寶在春三二月帶領衙役來到清樂鄉，縣吏備辦好花酒和春鞭，父老在官亭迎接；太守深入田間，給挑糞的農夫、騎牛的牧童、摘桑的農婦、新茶的村姑一一賞酒插花，寫的就是湯自己在遂昌下鄉勸農的經歷——

山也清，水也清，人在山陰道上行，春雲處處生；官也清，吏也清，村民無事到公庭，農歌三兩聲。（《牡丹亭·勸農》）

徵徭薄，米穀多，官民易親風景和。多風化，無暴苛，婚姻以時歌伐柯。平稅課，不起科，商人離家安樂窩。（《南柯記·風謠》）

“四夢”中所展示的這一政清人和昇平景象，也就是湯顯祖殫精竭力要把遂昌建成“有情之天下”的理想圖景。

滅虎除“害馬”

遂昌林深茂密，一到冬天，虎患四起，侵害人

畜，湯顯祖上任不久，農曆十月就出現了老虎從東北方向而來、在鄉西咬死牧童的事件。聽得這一消息，湯心中很是內疚，治遂局面剛打開，惠民事未辦幾件，現在竟連百姓的生命安全都沒有保護好。他反省自己是否“德不純，氣之不淑耶”，“刑不清，威之不震”，才有這暴戾的“煞氣”。“災由人興，非虎非豺”，他決心發動一場打虎運動。湯顯祖擬定文告徵招鄉勇，但好幾天沒有一個青壯來應招。原來有人說老虎傷人是神仙下凡收惡人，誰要是殺虎誰就要受到神的懲罰。湯顯祖信仰道佛，為了把滅虎運動開展起來，他率眾鄉民到城隍廟祭告禱曰：“吾與神共典斯土，人之食人者吾能定之，而不能止於虎。民曰有神，夫虎亦天生，貴不如人。神無縱虎，吾將殺之。”（〈遂昌縣滅虎祠記〉）以此一掃民眾疑慮，很多人來報名了，進山獵虎隊也就組織起來了。

湯顯祖率領滅虎隊來到虎患最嚴重的葉塢。葉塢在縣城以西約二十里地，屬三仁鄉。滅虎隊在葉塢發現虎情，馬上展開打虎行動：

之葉塢，午至昏，見虎。虎奔，一虎踞高隅，薄不可近。（……）是夜不能寐，覺外洶洶有聲。問之，獲巨虎，雄也。虎首廣尺餘，長幾二尺，身七尺。驚其雌，三日繞而號其山，中伏矢，走死松陽界中。東北抵萬山，忽夜震如裂。民曉視之，得巨虎首二、八股。草血洟漬。縣人歡，異甚。（〈遂昌縣滅虎祠記〉）

這年冬天，滅虎隊打死了三隻大虎、五隻小虎。有虎患的鄉村都行動起來了，全縣共打死大小老虎十七隻，從此老虎銷聲匿跡了。為了紀念這次群眾性的打虎運動，湯顯祖在城內報願寺旁大樹下建了一個“滅虎祠”，並親自撰下〈遂昌縣滅虎祠記〉。

虎患平息，“盜酋”卻在作祟。那些從鄰縣來的流民，有些淪為“盜賊”，與當地無賴子弟相勾結，濫伐山林，偷採礦藏，也有盜酋心狠手辣，謀財害命。湯顯祖“乃稍用嚴理課”，“勒殺盜

酋長十數人”，除暴安民，人心大快。

湯顯祖為政清廉，“於祿固無所愛”，“非有學舍城垣公費，未嘗取一贖金”，遇到依仗權勢前來收受財物的“長官重客”，湯“即與冠帶並坐堂上，所受辭不二三紙”（〈答吳四明〉）。這樣幾次，客人見撈不到油水，也祇好皺着眉頭走了。還有一種江浙人叫“吃蹭飯”的斯文乞丐，乃利用關係假借名義索錢要物“打秋風”者。一個叫王伯皋的人，本與湯有一面相識，要到遂昌來撈油水，湯顯祖回信說：“遂昌斗大的縣，賦寡民稀。（……）今歲訟裁五十餘，而三食故人。食者踵至，何以待王先生？”（〈答王伯皋〉）王也不好意思來了。更有個辣手的問題是，一些豪強人家拖欠田賦不交，不僅自己偷漏賦稅，還包庇親族，以往縣官對此問題不敢硬碰，睜隻眼閉隻眼。然而徵收田賦的任務完成的好壞，是考察地方官政績的重要依據。山東騰縣趙邦清的做法是，發現“土地不分等，以丁載糧，豪紳大戶霸佔土地，地多且沃，隱瞞丁畝，偷漏賦稅。農民丁稠地少，地瘠稅重，破產流亡”，趙親臨田野丈量土地，均平賦稅，懲治富豪，使縣內“耕各有田，地各有主，賦各有頭”，百姓無不拍手叫好。遂昌也有這樣的“豪紳”，他就是聲勢顯赫的項應祥。此人號東麓，縣城北隅人，師從前任首輔王錫爵，明萬曆八年進士，初任福建建陽知縣，後任華亭知縣，萬曆二十年陞戶科給事中，繼任禮科、工科左右給事中、吏科都給事中等職。明代給事中是言諫之官，雖官不過七品，但職能是“稽查百官之失”，權頗重，多少大官都不敢得罪他，“斗大遂昌”，誰還惹得起他。湯顯祖可不信邪，就拿他開刀。他致信項應祥，催繳他家欠交的稅賦，言辭委婉，但筆意見血：

（……）後見貴倨家，武橫奸盜，往往而有，不治不止。既以治之矣，而前後見府主以上，爭言縣某某家所負。（……）近察貴縣民負者，非盡窮極無所還，多故大姓而落者，恥去其名，留所賣去田，或反益收入田自實。（……）豪弱等皆王田，而逋而抗，非法也。頑且倨

焉，而遂之，非教也。後必並徵，貽難後人，非義也。並徵益以蹙，非惠也。（……）至於足下家稅所負，歲至若干，亦以門下方為國侍從，未忍以租來賦為言，知門下病起，必有處也，而乃可為子孫法。今並上門下數戶並貴宗若戚所影佔藉附上。（〈覆項諫議徵賦書〉）

“貴倨家，武橫奸盜，往往而有，不治不止”這幾句話，便是說給項應祥聽的。不問大戶還是貧弱小戶，佔了皇田都應交賦，不交就是“非法”對抗拒交，我若聽之任之，便是“非教”欠賦留給後人交便是“非義”以後新老欠賦一起交，就更犯愁，便是“非惠”。湯顯祖把項家親族所欠田賦和隱藏本族親戚的田賦名冊一起附上，項應祥接到這封信感到不好辦。因為欠賦不交，於情於理都是說不過去的。項應祥與湯顯祖關係還是不錯的，項在為湯新建的尊經閣作記中對湯顯祖評價頗佳：文才，“聲馳宇內”；品節，“抗疏大廷，權貴辟易三舍”；遷官遂昌，“諄諄民瘼”，“其政勤”；口才，“滔滔若長江大河，一瀉千里，其論淵以博”；“是文章、節義、政事、言語，侯身兼之”。（〈平昌湯侯新建尊經閣記〉）項深知湯顯祖不好對付，早在南京時就被人稱為“是狂奴，不可近”，便及時寫了回信：

不佞離家日久，所有門戶一應事宜，俱失料理，（……）所坐田額及應納錢糧俱付一族弟代管，即其人兢兢不敢自罹於法，第不知比年錢糧完欠何似？況近奉嚴旨督責，不肖固嘗從有司備知其苦，敢以家門貽公府之累也。不佞子侄三五人，束縛一館，毫不與聞外事，明府素所鑒亮。倘有假名色以干恩澤者，望執事盡法處之，則不佞拜賜多矣！（〈東湯明府〉，《醢雞齋稿》卷六）

就信中作了一番辨解之後，對所欠賦稅還是不得不交。項家交了，其他大戶人家就更不敢再拖欠。此事固然令項應祥顏面不好受，然而令項切齒在心的還是他的一個兒子的不法事。

傳說遂昌城有位惡少，是項應祥的一個兒子。他仗父勢橫行鄉里，姦淫良家女子，凡貧窮人嫁女，他就要霸佔初夜權。對此，遂昌百姓切齒痛恨，受害人家也曾告狀到縣衙，但狀子一張張如石沉大海。趙邦清在騰縣敢將寧德王妃的父親劉鶴打死人命按律處斬為湯作出了榜樣。但湯顯祖瞭解案情後，沒學趙邦清那樣“強攻”，而是“智取”，他選擇項應祥從朝廷回家養病之機，在縣衙擺宴為項接風洗塵。酒過三巡，忽有受害的百姓來縣衙擊鼓鳴冤，湯顯祖指令衙役：“今日老爺宴請項諫議，概不理事！”命衙役斥退呼冤者。不久擊鼓聲又起，湯顯祖佯裝發怒放話：“強請陞堂者打他二十大板！”在旁的項應祥不知是計，以冠冕堂皇姿態表示對鄉親民意的關心，建議湯應以公務為重，自己要退席讓湯陞堂理事。顯心裡暗喜，知項已“入彀”，於是提議一面喝酒一面和項共同審案。湯顯祖這一提議，博得陪席鄉紳一致叫好。衙役一傳令，前來告狀的人一窩蜂擁上公堂遞上狀子，拆開一看，告的都是項家惡少姦淫民女枉殺佃戶的不法事。事態至此已推車就壁，項應祥回天無力，為了死撐項家門第威風，祇得強充“大義滅親”的角色，當晚用石灰水將親生的“逆子惡少”淹死在後花園延秋亭水井中。

湯顯祖敢於為民請命秉公執法除“害馬”一事在外縣傳開了，竟致鄰縣士民有冤假錯案的也跑到遂昌縣來投訴。傳說龍遊縣的布販陸兆明因綢緞生意好又缺本錢，年初向靈山放貸親戚周長根借得二千緡，用房田契作抵押立了借據，利息二成，明年正月本息一次付清時贖回契據。陸經營有方，到本年八月就提取贏利二千四百緡錢趕到靈山還債，不料半路上遇上一個父死無錢葬、母病無錢醫的少年，陸慷慨解囊拿出了六百緡錢救助落難之人，祇攜一千八百緡錢還給周家，餘款六百緡隔天再奉上贖回所押契據。周心懷鬼胎說，今收你一千八，不另開收據，明天還清了，契據自然歸還。陸不虞有詐，以誠信感激之情爽快同意了。第二天，陸拿着六百緡錢去還清要取還契據，那知周長根竟翻臉不認賬，說還有一千

八百緡錢沒還。周有口難辯，大喊冤屈。周的兒子把六百緡錢扔出門外。陸兆明告到龍遊縣衙，糊塗縣官說借據上寫明是明年正月歸還本息，周家契據在握，而陸空口無憑，斷為賴賬誣告，被打得皮裂肉綻。陸聞遂昌湯縣令愛民如子，秉公斷案，便連夜冒死爬行到遂昌縣衙擊鼓鳴冤。

湯顯祖聽了陸的申訴後，越俎代庖接下案子，思想片刻即抓起一根火簽速命兩名馬快赴靈山，以隱匿遂昌和靈山交界山中強盜的贓物為由，將周長根捉拿歸案。周為了要洗刷罪名，供出了陸兆明用房田契作押，已還借的一千八百緡錢。一場無賴欺詐案，以湯“區區之略”便水落石出。湯顯祖既為遂昌“剪除害馬”，也為鄰縣除掉奸邪，深受百姓愛戴，“一時循吏聲為兩浙冠”。然而，因此卻招致那些“害馬”忌恨，“士民惟恐弟一旦遷去，害馬者又怪弟三年不遷”。（〈答李舜若觀察〉）

縱囚施感化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湯顯祖第一次赴京參加外察（吏部對地方官的考核），在山東騰縣短暫停留，和縣令趙邦清一起上路進京。在京師遇到去歲十二月授吳縣知縣、即將走馬上任的袁宏道。在京，湯還特意去探望了因剛直不畏權勢而下獄的御史彭應參。彭因浙江烏程縣退休歸家的尚書董份、祭酒范應期橫行鄉里，浙江巡撫王汝訓欲繩之以法，巡按御史彭應參至此，令烏程知縣張應望將范拘捕。范畏罪自縊而死，其妻吳氏赴京訴冤。皇帝老子發怒，命將彭應參、張應望下獄。張被流放煙瘴之地，而彭應參關在獄中，連舉薦王汝訓、彭應參的吏部尚書孫丕揚和都御史衷貞吉都受到牽連。湯顯祖去探獄表達了對彭應參遭遇的同情，後來又寫信安慰為此案遭到削職處分的王汝訓：“私議在彼人，公議在天下。”（〈慰浙撫王公〉），贊揚彭應參敢和湖州豪紳較量乃“真為世界傾洗一番”，為此事削職是“身為男子，高步中原，他更何論？”（〈寄彭魯軒御史〉）。

考核完畢，湯和袁宏道於二月初六日一起離京出關，中途袁有事離開，湯在路上等袁，袁卻遲遲未來，湯祇有乘京杭大運河官船先到杭州，後改陸路回到遂昌。

湯作地方官首次進京接受考核，從他三年後寫的〈感宦籍賦〉所揭露的官場醜態來看，他已領略了官場奸賢顛倒之惡狀，令他“不得意”而“忽忽思歸”。當年七月，帥機去世，《紫釵記》改定稿完成，他便寄一抄本給帥的兩個兒子從昇、從龍，囑他倆要放在帥機靈柩前，用舒緩的長聲歌唱，讓帥機亡魂欣賞。

遂昌經他近兩年的治理，文教設施初具規模，虎患得以消除，“稍用嚴理課”，“勒殺盜酋長十數人”，對治縣產生震攝作用，社會治安明顯好轉。他“見到桑麻牛畜成行，都無復徙去意”（〈寄曾大理〉），他早年師從羅汝芳接受王陽明“致良知”的道德說教，其意就是“勸善”。王陽明最後一次領軍評定地方動亂之後，認識到“破賊”固然是一種“懲惡”，“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湯顯祖認識到，要使遂昌長治久安，應在“懲惡”之餘施行“勸善”。湯對遂昌吏民親切和善，“戲叟遊童，時來笑語”（〈答余內齋〉）；對待罪犯，“去鉗枷，罷桁楊”，即去了束在犯人頸上和腳上嚴酷刑具；主持訴訟既嚴明執法，又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施行感化；遇到百姓打架鬥毆告狀，先將傷者交給何曉治傷，然後再審案；遇囚犯患病，常自己出錢請何曉買藥治之；偶有審案時因差役用刑致人受傷，湯立命何曉診治。

何曉是湯的私人醫生與幕客，本省江山縣人，不識字，擅拳有俠氣，殺死過劫賊數人，因事“為縣官所侮”，憤恨離鄉流浪，“道遇奇客，口授禁方”。何曉流浪到遂昌，湯慧眼收留他在縣衙作“醫生”。何品行端正，醫術高明，把脈用藥常有奇效。有兒童被老虎咬傷，他能用自製藥膏治癒。何與湯朝夕相處五年，言談不涉私利，常提醒湯為官要廉潔正直，為人要厚道疏放。某富人、某勢家想作亂害你。後情況果然如其所說。湯治遂五年，沒有拘捕過一個婦女，也沒有打死過一個囚犯。萬

曆二十五年，何曉思家要回江山，湯也要赴京上計，且打算棄官而去，於是沒有挽留何，並作詩相送。全縣人聽到何曉要回家，沒有人不泣，希望他留下，就連衙門差役及囚犯也都愴然。

萬曆二十三年，湯顯祖在遂昌過第二個春節。除夕在即，湯沒有忘記關在監獄失去自由的囚犯。大年三十，他去監獄視察，看到犯人們分到酒食，卻因不能回家過年，個個愁眉苦臉，在獄神前抱恨懺悔，令湯顯祖生了憐憫之情。他想到趙邦清在騰縣，每遇節日將宅中所剩菜羹分給獄囚，獄囚們感動得流淚；又想起了大唐英主李世民出於憐憫之心，與死囚訂立“君子協定”，放死囚回家跟親人道別，來年秋天至京城赴死刑，結果所有囚犯如數還京，無一人在逃，最終將他們全部大赦。

湯顯祖認為，欲把遂昌治理成像盛唐一樣的“有情之天下”，就要敢於在施政上有非常之舉。他要一破《大明律》，施行人情感化，做法唐太宗，將在押囚犯放回家過年，也和他們訂個“君子協定”，限期三日歸監。此事發生在吳拾之來過遂昌後，事後湯把此事告訴老朋友，並附上了〈除夕譴囚〉詩：

除夕星灰氣燭天，醅酥銷恨獄神前。
須歸拜朔遲三日，湏見陽春又一年。

情之所至，金石為開。所譴囚犯，個個如期趕回。元宵來到，遂昌滿城笙歌，一派歡樂景象。湯又想起獄中囚犯不能與大家同樂，漆黑的牢門內看不到一絲燈火，他又下令撤斷星橋之鎖，讓黑暗的牢房透進光明。他令囚犯們個個梳洗一番，換上乾淨衣服，由獄官帶着上河橋（今東廊橋）觀看花燈：

繞縣笙歌一省囹，寂無燈火照園烏。
中宵撤斷星橋鎖，貫索從教漏幾星。

這件事在決策前，故鄉舊友姜耀先來遂昌。湯和姜討論過此事。因是非常之舉，姜擔心“恐有得間者”。事後湯去信告知並問姜：“兄肯放大光明，一破此無間乎？”並附上縱囚觀燈詩。如此看

來，“譴囚”與“縱囚”或不是發生在同年的兩件事。“縱囚觀燈”當在先，約上任後的第二年；“譴囚度歲”在後，約上任後的第三年。“譴囚”比“縱囚”風險大得多，“譴囚度歲”成功了，元宵夜把囚犯放出來站在河橋上觀燈，有何“恐有得間者”？而〈遣囚〉詩寫給姜耀先，〈縱囚〉詩寫給吳拾之，若兩件事發生在同年，且取得成功，則兩詩應會同時附上給兩位老友。

“縱囚”之舉雖不是湯顯祖的發明，除唐太宗有“歸死罪者二百九十人於家”（《舊唐書·太宗本紀》）外，從後漢、兩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正史和筆記所記官吏、皇帝縱囚之事有二十餘條（清·趙翼《陔餘叢考》）。然湯顯祖的“縱囚”意義在唐太宗之上。太宗是一國君主，若有頑囚乘機潛逃，“天下之大莫過王土”，你逃往哪里？即使出了問題，也不可能追究皇上的責任；而湯顯祖是受貶謫的罪臣，剛從煙瘴之地“量移”到這山間小縣，一旦有頑囚犯潛逃，山高林密的遂昌到哪兒去抓？宋代歐陽修指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違反法度，祇不過是借此邀取名譽的一種手段，後世多少帝王不敢做法，而湯顯祖身為受貶的七品芝麻官，卻我行我素，在“譴囚度歲”後又“縱囚觀燈”，表現了敢作敢為的政治魄力。湯顯祖認識到要把遂昌建成“有情之天下”，就必須在在施政上“唯更有以督教，加愛於民”（〈與黃對茲吏部〉），在“貫索從教”中體現“情”的感化力量。

交遊與“著書”

“斗大遂昌”祇因湯仙令以“情”施政，“諄諄民瘼”，百姓口碑載道。在“一睡三餐兩放衙”之餘，交遊是他另外一個生命活動與自我表現的場域，少年好友，文壇名士，禪林大師，紛至還來。湯顯祖自己也走出去，與政界文壇“氣義”之士請益交流。

就在顯祖上任的當年七月，遂昌射堂剛建成，學舍還在興建中，當年和湯在南京合作《紫簫記》因“是非蜂起，訛言四方”而分袂的吳拾之“過

平昌”，“悠悠世路交情見”。今番相見“異鄉縣”，令他“寒從一夜去，春逐五更回也”！（〈玉雲生過平昌，徐生畫扇為別〉）吳有一副好嗓子，“弦歌市裡合宮商”，又亮開嗓門盡興唱了幾段。第二年，湯的臨川少年時代結交的另一好友姜耀先也來訪，湯和他討論了想“縱囚觀燈”一事，姜提醒湯“恐有間者”。“邂逅無多難可忘”，十年後的吳拾之與姜耀先都與科場無緣，湯雖中了進士授了官，卻飽受宦海的驚濤駭浪。把酒回憶少年事，彼此都感歎光陰易逝，人生苦短，轉眼鬚顏蒼老。

第三位來訪的是屠隆。萬曆二十三年“日初長”的春三月，屠隆由鄞縣南下經天臺、歷雁蕩、渡甌江、過麗水到了遂昌。屠之來訪不是因革職窮困潦倒“打秋風”，而是應湯顯祖的再次邀請。在此之前，湯已作過邀請，並打掃好竹林寺（報願寺）供下榻，但“竟成子虛”。“羊溝蚶谷，何得赤水之珠”（〈東長卿〉），可見湯邀屠的誠摯之情。

遂昌經湯兩年治理，呈現“琴歌雪積訟庭閑”、“市上無喧少鬥雞”的昇平景象。“得意處別自有在”，公餘閒暇便“借俸著書”。所謂“著書”，除寫了詩文245首（篇）之多外，還對《紫釵記》進行修改定稿和《董西廂》的批訂；更為重要的是還開始了《牡丹亭》的構思與寫作。明末清初史學家查繼佐《罪惟錄傳·湯顯祖傳記》有載，相傳湯在“譜《四夢》”時，連坐着轎子去會客都沉浸在劇本之構思中，每想到好曲詞馬上就寫成條幅，粘在轎頂上，“數步一書”，不知疲倦。坐着轎子會客，是縣太爺的風景。所謂“譜《四夢》”，就是寫作《牡丹亭》。萬曆二十五年梅禹金對湯來信言：“近傳新著業已殺青，許八丈可為置書郵，何不以一部乞我？”（《鹿裘不寶集》）“殺青”指“新著”繕成定本或校刻付印。梅“乞”的“新著”是《紫釵記》，《牡丹亭》還在構思與寫作中。《牡丹亭》作為“新著”應是湯棄官歸隱臨川的次年秋正式完成，繕成正本，並加進餘意未盡而撰成的〈牡丹亭記題詞〉，準備校刻付印，那才是“殺青”的標誌。

屠隆是個能寫擅演的戲曲全才，自被余顯卿“挾仇誣陷”遭革職一直呆在鄞縣老家。鄞縣與遂昌都是浙內郡縣，相距不遙，湯顯祖多麼想和那昔日同僚好友與戲曲知音切磋曲藝。湯對屠隆的到來欣喜若狂。鄰縣松陽知縣周宗邠和屠隆也是性情相投的好友，聽到屠隆到遂昌喜出望外，“形神飛動，急書走迎之”。周宗邠擅彈古琴，“長卿大有聞琴興”，他們到松陽，在“夜筵開”過後，“夜聽”了周宗邠演奏的〈瀟湘雲水〉、〈天風環佩〉、〈漢宮秋〉和〈梅花弄〉四闕古琴名曲，“彈到夜鴻飛不起”，“卻教中散帶愁聽”。

在湯顯祖陪同下，“攜手同行遊縣城”，參觀“良宰先教化，講道明五常”⁽¹⁾的尊經閣，登上“平昌更漏始分明”⁽²⁾的啟明樓。〈春日登尊經閣〉⁽³⁾記下當年登閣在“春日”，證明了屠隆春天在遂昌，從而否定了屠隆不可能“在秋天以外的其他季節”來遂的武斷。

屠隆來時湯顯祖正在批訂《董西箱》。湯的〈玉茗堂批訂董西廂叙〉云：

（前缺）令平昌，邑在萬山中，入境僻絕。古廳無訟，衙退，疏簾，捉筆了霍小玉公案。時取參觀，更覺會心。輒泚筆淋漓，快叫欲絕。何物董郎，傳神寫照，道人意中事若是，適屠長卿訪余署中，遂出相質。長卿曰：記崔張者凡五人：北則人知有王、關，而不知有董；南則人知有李，而不知有陸。為子玄稱冤，並以娑羅園題評見示。且欲易余董本，余戲謂長卿：昔東坡欲以仇池石易王晉叔、韓幹二馭（散）馬，晉叔推之。錢穆公欲兼取二物，蔣穎叔欲焚畫碎石。竟成聚訟。予請以石歸蘇，以畫歸王；今日請以娑羅歸屠，玉茗歸湯。

署作時間是“乙未上巳日”即萬曆二十三年三月初三日。此時湯正在作《紫釵記》最後加工改定工作，於寫作中常取出《董西廂》作參考，深感董解元將劇中人物寫得生動逼真，就在於“道人

意中事”，即寫出了人物內在真情，從而令他在改作中“快叫欲絕”，創作思想產生了飛躍。

屠隆看到湯批訂《董西箱》，要把他帶來的《新刊合刻董解元西廂記》相交換。這是他親自批訂、周居易校梓的一種合併本。屠隆說，寫崔、張愛情故事的《西廂記》有五部，北方人祇知道王實甫本和關漢卿本而不知有董解元本，南方人祇知李日華《南西廂記》而不知陸采的《南西廂》，他為陸采感到“冤”。屠隆批訂的《合併西廂》中特收進了陸采的《新刊合併陸天池西廂》二卷，用實際行動“為子玄（陸采）稱冤”。像這樣有價值的戲曲史料卻被人判為“偽作”，然而湯顯祖同時代的劇作家張鳳翼在其〈《西廂記》考〉中有言作證：“以故赤水屠先生、義仍湯先生均為當世博洽懷覽君子，亦於《西廂》訂正擬閱，蓋不以曲詞口（苴）視之也。”⁽⁴⁾因而所謂“偽作”實為誤判，應該推倒。

屠隆和湯顯祖在討論戲曲之餘，還讀了自湯在京都分袂十多年來的全部新舊詩文，有感湯詩“令德日新，而詩道亦且日進，登峰詣極”⁽⁵⁾，認為湯的詩文“獨步方今，且將陵轢往古”，令屠隆“自歎以為弗如”。⁽⁶⁾湯和屠隆在遂昌切磋戲藝，吟詩賦詞，寄情山水，笑談人生，促使他們對戲曲文學的新思考，激發了他們在戲曲創作上的新熱情。屠隆此行原計劃暢遊浙東的麗水、青田、縉雲、天臺等地山水勝跡，忽惦念家中九十高齡老母的飲食起居，便不顧湯顯祖的再三挽留，要回鄉侍親。湯顯祖對屠隆倉促而別感到悵然若失。

屠隆回到鄞縣後，八月去了蘇州，與吳縣縣令袁宏道、長洲縣令江盈科在闔閭城下泛舟，忽聞前浙江海道副使丁此呂受誣於七月在南昌被捕。屠隆隨即溯錢塘江、富春江而上，想直奔江西與丁此呂泣別。到了蘭溪，縣令趙符卿告訴他丁已被押解北上，在“慟哭歧路，踟躕何之”的情況下，屠隆經龍遊轉道遂昌再訪湯顯祖，目的是向湯打聽丁的消息，並商討設法營救⁽⁷⁾。

湯顯祖一面安排好屠隆的遊玩，一面派人到南



明揚州鈔關遺址

昌探聽丁被逮情況虛實。湯陪同屠隆因三月來去匆匆未及觀遊的遂昌近郊勝跡，他們在“一樽落日”時刻上了眠牛山，攀了“峰頂絕人群”的妙高峰，探了“石上靈泉瀉不停”的含輝洞，仰望了“千年怨氣凌霄漢”的飛鶴峰，踏過了城西三十里外“山氣高寒鳥不啼”的白馬山，還遠足到八十里外的青城山，領略了“萬仞飛泉掛石龍，青城如霧洗芙蓉”的天資神韻。每到一個景點，湯與屠都有詩作唱和。這些詩作，展現了遂昌的山川奇美，表達了詩人的熱愛深情。

十多天後，去南昌探聽丁此呂情況的人回來了，帶來抄下的丁被捕時手書的絕決詞。湯顯祖將它出示後，“各哽泣不能讀”。湯顯祖就此“感懷成韻”，作詩一首並寄禮部尚書張位：

哀響秋江回雁聲，雨霜紅葉淚山城。
年來漢網人難俠，老去商歌客易驚。
貝錦動迎中使語，衣冠誰送禦囚行。
長平阪獄沖星起，可是張華氣不平。

（〈平昌得右武家絕決詞示長卿，各哽泣不能讀，起罷去。便寄張師相，感懷成韻〉）

張位是湯的老師，和丁此呂都是江西大同鄉，時為文淵閣學士。湯顯祖懷着憤懣的心情，向身居閣老高位的老師傾吐，痛斥那些專事捏造事實製造冤獄的朝廷使者，抨擊當朝的法制與權貴。

丁此呂的被逮是因朝中不同政治利益集團（所謂“黨爭”）相互傾軋而蒙冤。湯、屠對丁的不幸遭遇“氣不平”。屠來遂昌是要和湯商量營救丁此呂。他們的營救計劃被屠的反對派知道了，把屠隆打入丁的同黨之列，即所謂“掛黨籍”。屠隆母親知道此事後，怕兒子招禍趕忙派家奴上遂昌促歸。母命難違，屠隆祇有及時返程，湯顯祖要留他也留不住。摯友被誣遭逮的陰影揮之不去，想起屠隆被革職後“蹭蹬”江湖，湯顯祖無法開懷。臨別時，湯在北界九華館為屠隆餞別。“杯殘忽不歡，空堂燈影寒”，湯冒雨送將過七津渡直至城北三十里的侵雲嶺，兩人依依惜別。

第四位來訪的是名震東南的大和尚達觀。自湯顯祖上疏遭貶徐聞，達觀“每有徐聞之心，然有心而未遂”。湯顯祖量移遂昌縣令後的第二年十月，達觀因晚明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大師被誣，神宗要把他遣戍雷州半島。達觀得知，第二年趕往南京下關旅泊寺與憨山相見，後從錢塘乘船逆水到龍遊，然後爬山越嶺來遂昌訪湯。他登上離遂昌還有六十里地的赤津嶺（即今新隘嶺），氣喘吁吁，熱汗涔涔，即興口占歌謠一首：

湯遂昌，湯遂昌，不住平川住山鄉。

賺我千巖萬壑來，幾回熱汗沾衣裳。

（〈題留湯臨川謠〉）

《遂昌縣誌·城池》卷一

湯顯祖為達師的來到作了周到的安排，親自帶他遊城北郊十八里處的唐山寺。這裡是“冠絕絕境”，有潔泉、紅魚和“月映波心”等獨特景觀。這寺原是唐末五代畫僧貫休修行十四年之處。貫休俗姓湯，故又叫“湯休”，他畫羅漢狀貌古野絕俗超群，為我國繪畫史上一絕。達觀不辭辛勞而來，是時念“定打破寸虛館”的心願，湯顯祖卻入世情深，未能如願。達觀回去又經過赤津嶺，寫詩懷顯祖，有“須信湯休願不灰”句，用“湯休”代指湯顯祖，表達他對度湯出家之“願不灰”。達觀還函湯顯祖借在唐山寺中所見景觀和傳說故事進行說法：

(……)泉潔峰頭，月映波心，紅魚誤認為餌，虛自吞吐。吞吐既久，化而為丹，作魚得以龍焉。故曰，龍乃魚中之仙。

(〈與湯義仍之一〉《紫柏老人集》卷二三)

說寺中清潔山泉從峰頭流下，明月從山頭投到池中。池中的紅魚以為是食餌，總是吞吐着去咬那一片虛空。千萬年堅持不懈，月亮還是月亮，月影卻在紅魚的至誠之前變成一粒金丹，魚兒終於化龍修成正果。但湯在〈答達觀〉的詩裡卻說“前身那擬是湯休”，不是謙虛自己不能與湯休相比，而是委婉表達還沒打算作湯休那樣的出家人。

湯的出遊不純是為了遊山玩水陶冶性情，還借機進行為政為文的切磋交流。萬曆二十二年冬，湯赴京參加吏部對地方官的考核，得知趙邦清把山東騰縣治理得很好。在赴京途中，他特去拜訪，上門取經。在北京，他與湖北公安縣的袁宗道、袁宏道和袁中道三兄弟相見。此時的三袁，祇有老大宗道是萬曆十四年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老二宏道是萬曆二十年進士，剛授吳江知縣；老三中道還未中舉(萬曆三十一年才中舉)。他們從萬曆十七至二十年已多次接觸李贄請教學問，眼界大開，思想為之一變，產生了對文壇復古風的不滿。萬曆二十一年四月，袁氏兄弟等往麻城專訪李贄，聚談十餘日，所論極為廣泛。李贄對袁氏兄弟稱贊有加，云：“伯(宗道)也穩實，仲(宏道)也英特，皆天下名士也。”在李贄的影響下，三袁開始了對復古派宣戰的思考，但無實際行動。湯顯祖早在南京為官前就在詩文創作中特立獨行，到南京任官後從理論上開始了對前後七子的批判。三袁無論從年齡、資歷與文壇上的聲望都屬湯顯祖的後學。湯到京後，袁家兄弟慕名與湯接觸，受到袁宗道及翰林院官員宴請。在京與三袁的短暫交往中，湯顯祖慧眼識得他們才識與膽力迥絕，從而引為知音給予鼓勵。在湯顯祖的影響下，袁宗道於萬曆二十三年發表了他的重要作品〈論文〉，

猛烈抨擊前後七子違反文學發展規律、宣導句擬字摹食古不化的傾向，批評了“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指出復古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主張文學創作應“從學生理，從理生文”。〈論文〉成了反對復古派的一面旗幟，表達了對當時文壇霸主的蔑視，也是對當時腐敗文風的宣戰。到萬曆二十四年，袁宏道在吳江知縣任上為其弟中道的詩集作序，正式打出“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口號，令一批持有相同主張的文人會聚一起，互相交流為文賦詩，文學上的公安派正式形成。

萬曆二十四年(1596)秋，湯到紹興結課即結算遂昌的錢糧，趁機去探訪已從餘姚遷來紹興的孫如法(世行)。這位仁兄與湯顯祖、呂玉繩(胤昌)都是同年進士，第二年授邢部主事。他也是個狂狷之士，萬曆十四年上疏論建儲及諫阻鄭貴妃進封得罪了神宗，像湯顯祖一樣，被貶為典史添注，祇不過地點在潮陽；後一直隱歸林泉，把酒論曲，是位精通詞曲的行家。他和呂玉繩是表兄弟，呂的母親是孫的姑母，孫如法父孫鑪是呂的親舅。孫鑪出任吏部尚書之後，於萬曆二十一年與考功郎中趙南星主持京官考核，孫鑪將時任河南參政的外甥呂玉繩和趙南星的親戚王三餘，因政績不卓偶有失誤而予以貶黜。呂玉繩從此隱居林下，以戲曲自娛，再未出山。王驥德是個“湖海散人”，這時還在山陰知縣毛壽南家裡當家庭教師，但他的戲曲理論研究為徐渭所器重，連沈璟也服膺。孫如法曾向湯介紹並贊賞了王驥德的作品《題紅記》，還如實地傳達了王驥德對《紫簫記》的批評。湯顯祖聽後心悅誠服地說：“良然！吾茲以報滿抵會城，當邀此君共削正之。”這次來到紹興，就要親自登門向王驥德請益，但因王有事外出，未能如願。

萬曆二十五年(1597)，是湯顯祖治遂的第五年，年底就要赴京參加考核。“令不可及作，場不可數入”(〈寄伍念父〉)。這次考核過後，自己的位置就要挪動了。他已聽到了傳言，說朝中某“貴人”為他說話，雖回不了京城作京官，擬

遷溫州作通判。溫州知府的劉芳譽是湯的好友，對此消息信以為真，為湯在溫州造了五間書樓。當年秋，湯在遂昌士子鄭孔授、時可諫和朱九綸等陪同去溫州，和劉芳譽碰面瞭解情況，然後順便遊覽了東甌山水。

湯顯祖從遂昌順甌江而下到了青田。這裡是“學為帝師，才稱王佐”的明朝開國元勳劉基故里。劉伯溫就是從這裡走出去，輔佐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天下定矣有宰相不做而歸隱故里。此地如“桃源仙境”，臥龍山與伏虎山對峙如門，故稱“石門”。石門飛瀑從112.5米懸崖傾瀉而下，濺若跳珠，散似銀霧，聲若雷鳴，終年不絕。飛瀑在陽光照射下，如雨後彩虹，斑斕紛呈，極為雄奇壯觀。那飛瀉的白泉宛如白鶴繞着青田上空盤旋。湯顯祖有詩記下此景：

春虛寒雨石門泉，遠似虹霓近若煙。

獨洗蒼苔注雲壑，懸飛白鶴繞青田。

（〈石門泉〉）

溫州素稱“東南山水甲天下”，樂清東北的雁蕩山是“寰中絕勝”，因“山頂有湖，蘆葦叢生，結草為蕩，秋雁宿之”而得名。山中的大龍湫瀑布為“天下第一瀑”。欲睹山水之奇秀，“不遊雁蕩虛此生”。湯顯祖在遂昌來的士子引導下，去雁蕩山睹一方之勝概，覽奇峰、奇石、奇瀑、奇洞的“怪誕高華”。

湯一行人沿丹芳嶺(四十九盤嶺)入西內谷，大龍湫就深藏幽谷之中。他們進山後就迷路了，想去看大龍湫瀑布，不知如何走，便去問採茶女。採茶女指說轉過前面那座剪刀峰就是大龍湫了。果然，轉過剪刀峰，眼前一亮，境界大開，大龍湫赫然在目。瀑流經龍湫背從連雲峰凌空掛下，像銀河倒瀉下來，十分壯觀。一般遊人至大龍湫後多折頭而返，湯顯祖則繞道攀險，“遂踏龍湫雁背”。

湯顯祖在西內谷盤桓幾天，留連雁蕩奇山秀水。雁蕩山茶清芳，他遙想劉、阮天臺山遇仙，鍾情“秋色見桃花”景觀。湯還去了麗水瞻仰當

年他補縣諸生時慧眼識才的良師何鏗隱居的悠然堂，詩贊“傲吏懷人向此間”；遊了縉雲仙都、麗水萬象山、桐廬仙境、越國美女故里——諸暨、蕭山西興等地，所到之處，都留有詩篇，所詠清新雋永，直抒胸臆。

掛冠歸里

萬曆二十五年(1597)秋冬，湯顯祖遊溫州回來，忙於準備明年赴京接受吏部考察。明代對官員的考察程式是分級考評，層層匯總，逐級上報。府、州、縣等中低級外官，先由其正官或上級正官初考，然後進京再由布、按二司考評，結果送吏部考功司復核。杭州是省府所在地，湯顯祖已在三月赴杭州接受省府正官的考評。他帶着書僮下了仙霞嶺到了龍遊，從龍遊順衢江“蕩舟長日”下杭州。為打發舟中日子，湯叫書僮從書箱內找本《高士傳》給他，書僮沒找到，便拿了本《宦林全籍》。此事令湯“反復循玩”。《高士傳》為晉皇甫謐所撰，紀錄自上古至魏晉隱逸之士九十六人，而《宦林全籍》是全國各地官員鑽營官場的生平經歷，對照現實政治與社會，產生了當今社會無高隱之士、唯見陞官發財鑽營者的聯想。在此啟迪之下，湯顯祖將入仕以來所見所聞官場中種種黑暗醜態，疾書〈感宦籍賦〉。說的是：官場是公侯卿相、皇親國戚和有錢人的天下。有幸為公侯之子、卿相之孫，依賴先人之力世襲官爵，終身享受榮華富貴。這些人憑着得天獨厚的優勢，不學無術，“托江河而猥大，依日月而常新。不必學書學劍，自然允武允文”。那些“駙馬都尉”皇親國戚，有直通皇上這層關係，便可“既富其何費，獲至貴而無勤”。有錢者能使鬼推磨，有錢人就用錢買官，“次則納貲而為郎，亦以財而發身”，“買功爵於攫金之後，乞告身於枕袖之時”。“清流之跡”即那些是沒有旁門可走，祇憑個人實力而擠身仕進，那可要經歷漫長的艱苦努力，以致“寒暑侵而靡覺，骨肉怨而不辭”。

官場寵辱不定，賢奸顛倒，無公理正義可言。官員素質良莠不齊，相差懸殊，“有金玉之英，必有糞土之士”。對官員的陞遷極不公平，“有終身於帝所，有絕望於廊阿；有十年而不調，有一月而累加”。對官員的處理也無是非標準，貪腐包庇現象非常嚴重，“有受萬金而無譏，有拾片羽而為震”；若沒有背景又不行賄的中下級官員，若有閃失，便一輩子翻不了身，“有微敬而輒振，有一蹶而永蹉”。湯顯祖對那些為了求得名列籍中，不惜逢迎諂媚賄賂買官，“緹騎惡子，前魚弄兒”奸猾狡詐之輩，感到痛心疾首。湯認為這樣的《宦林全籍》讀了“可以奮孤宦之沉心，窺時賢之能事”，即會因正直之士的悲慘遭遇而受到懲戒，對邪門歪道爬上顯赫地位的“時賢”而驚羨，從而學其惡形惡狀，令道德喪亂。

湯顯祖帶着對官場的體認，在萬曆二十五年底就動身趕到京城，參加吏部考核。這次來京途中，湯又路過山東騰縣。騰縣經趙邦清治理，“以貧弱之騰，三年而暴富”（〈騰侯趙仲一實政錄序〉），成為“河洛之間，蔥然一善國也。”（〈趙子暝眩錄序〉）令湯顯祖驚歎不已。湯對趙的政績和愛護百姓、憎惡豪貴的高尚品質十分稱贊，說他“常以死為百姓爭九則之命”，且自歎不如地說：“予天資怯弱人也，與仲一相遠何啻三千里，能一見而知之。”（《騰趙仲一生祠記序》）湯稱贊趙是個可稱雄一方的“伯才”（霸才），感到現在的官場像趙這樣的“伯才”太少了，自己雖然已作好歸隱準備，但也要讓趙邦清這樣好官放到應有位置，讓他發揮更大作用。在騰縣，因趙忙於公務，“不能得見”，湯就一人先進京，並帶着趙的簿籍準備向在內閣任次輔的老師張位推薦。

安徽宣城朋友梅禹金對湯的這次考察很樂觀，他也聽到了傳言，說湯的正直名聲已上了神宗的屏風，“不可謂不遇主矣”，“其時仁兄定遷去”（〈與湯義仍〉）。時任浙江右參政的好友唐守欽還寫來信向湯道賀。但湯自己心裡有數，貶謫徐聞僅半年就“量移”到遂昌當知縣，是劉應秋的積極活動，吏部主事陸光祖安排，但

背後還有張位的支持。張位是萬曆十九年秋申時行辭官退休而舉薦和趙志皋同時入閣的。首輔是王家屏，但王僅幹了半年就退了。神宗召王錫爵未到，趙志皋代理首輔職務。湯顯祖是張位才華出眾的學生，且又是江西大同鄉，明代官場，對自己的同年與學生視作親信給予關照是公開的秘密。湯到遂昌後，劉應秋曾告訴他，王汝訓（弘揚）已任浙江巡撫，與他的交情很深，行前私下對他說：“到任後數月即有揭赴部，欲兄早離苦海。”（〈與湯若士書〉）但結果是湯抵任後的第二年，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推薦湯回南京禮部任主事，被“留中不報”；御史、巡撫浙江王汝訓，也薦湯任南京刑部主事，又“部中暫謂遲之，方可有濟”。此中的“阻抑之者”，是“太倉（王錫爵）甚不喜兄”（〈與湯若士書〉）。那是當年上〈論輔臣科臣疏〉支持饒伸對王錫爵進行彈劾結下的怨。因此，對唐守欽的熱情祝賀，湯的回答是：“心知故相嗔還得，直是當今丞相嗔。”（〈漫書所聞答唐觀察四首〉）即不僅“故相”申時行“嗔”他，現任首輔王錫爵也“嗔”他。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王錫爵還朝任首輔，主政僅一年半，到萬曆廿二年五月也退了。“錫爵去，志皋為首輔。位與志皋相厚善。志皋衰，位精悍敢任，政事多所裁決。時黜陟盡還吏部，政府不得阻撓。”（《明史·張位傳》）趙志皋與張位同年入閣，兩人交情深厚，趙處事比較軟弱，內閣實權由張位掌控，這對顯祖的處境改善本很有利，但湯卻“求二三府百得”。儘管劉應秋告訴他“蘭溪（趙志皋）、新建（張位）於兄意似好”，但張位卻是不擅權術，“未能收拾天下賢士厚集其勢”。王錫爵雖退，“成言”還在，親信還在，“一時難轉手耳”。故有“貴人”推薦他任溫州通判，但他並不抱希望。

進京後，湯顯祖向張位推薦趙邦清，張位雖也認為趙邦清對騰縣的治理政績突出，可用為“御史行邊，專屯田鹽筴開塞之事”，但後來也祇陞了吏部稽勳司郎中。在京一看形勢，湯感到“新建（張位）當危”，去年由張位密薦參政楊鎬去朝鮮策

劃治理軍務，打擊入侵的日本豐臣秀吉軍隊，先勝後敗，死亡將士達兩萬之多。和楊鎬同入朝擔任贊畫(輔佐謀劃)主事丁應泰向朝廷奏報戰敗事實，並疏劾次輔張位、三輔沈一貫“與鎬密書往來，交結欺蔽”。楊鎬被神宗削職為民，張位受牽連而難逃其責。“沙堤無長處可藏春”，張位的地位不穩，在內閣唯一能為他說得話的人都沒有了，再呆在官場凶多吉少？因此，在湯顯祖看來，他的正直名上了神宗的屏風作陞遷對象是不可能的事：“祇是姓字人間有，哪得題名到御屏！”(〈漫書所聞答唐觀察四首〉)

湯顯祖對朝中形勢判斷是準確的。本年六月，官為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保的張位，政治生涯走到了盡頭。神宗撤掉張職務回家閑住。不久，御史趙之翰又上奏張位是炮製“妖書”(即《憂危竑議》)的主謀。最後張位被削職為民，“遇赦不宥”，直到他死後熹宗(1621-1627)當朝，張才恢復了官銜。

“作縣真如懸度國”。明代的知縣不是好差事，雖為朝廷命官“百里之侯”，擁有一定的治理權，但“縣百事統於府，舊例，小有故，必參謁。”(海瑞〈知縣參評〉)施政要經知府認可方能實施，直接管你的婆婆又多，不僅要按上司的眼色行事，還要照顧到縣官僚屬和境內鄉紳士大夫的利益。湯顯祖常感歎：“今日陶潛在折腰”(〈九日登處州萬象山，時繡衣按郎〉)。湯又是個獨行特立者，像“遣囚度歲”、“縱囚觀燈”那樣有風險是事，上司必然要挑剔，給他的考語又有何好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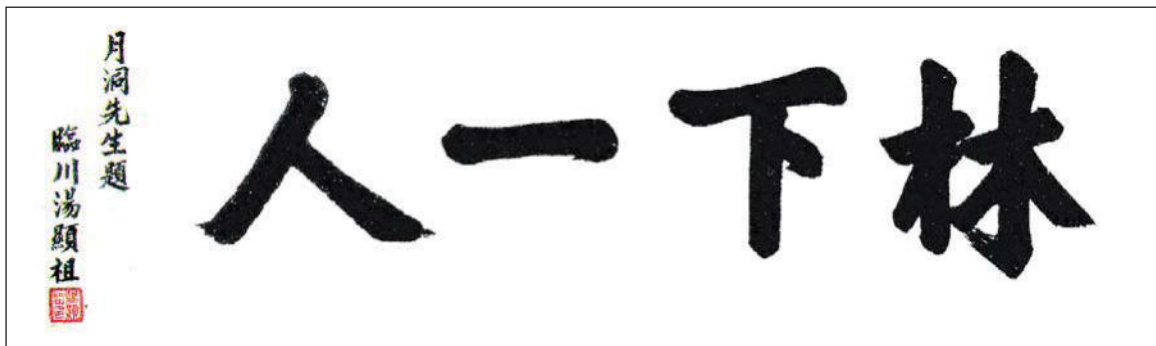
“遷官欲似飛來山”，湯對自己的陞遷已不抱任何希望，歸隱便提到議事日程。他在〈答范南官同曹尊生〉詩中道：

南宮幾歲得為郎，曾伴飛鳧入帝鄉。
薄莫縱歌燕市酒，青春如坐少年場。
萊蕪作令誰堪語，子建為文亦自傷。
況是折腰過半百，鄉心早已到柴桑。

回想自己大半生境況，青春年少時也曾有荊軻一樣的豪情，可出仕至今又同曹子建那樣壯志難酬，獨自神傷，而今已將半百，不能再為五斗米折腰了，該學陶淵明脫離宦海回鄉去了。他寫的〈感宦籍賦〉不僅僅是抒情言志之作，更應看成是起草好的辭官報告書。

三年前在京考核時，和剛任吳縣知縣的袁宏道相見，袁就和湯談到要辭官不幹，“區區縣令，朝夕更換，又無一成而不可去之義”，把當一個小縣令看成是束縛自由的“桎梏”，“自去秋來，已萌此志，曾與同事皆言及”。(〈氣歸稿〉)所謂“同事”就是湯顯祖。袁一到吳縣任上，便連上〈乞歸稿〉五道。這時湯雖有歸隱之心，但因“家嚴不許不官，加以帥郎仙去，歸亦煢煢，不如遊寓”。(〈答鄒大澤〉)

促使湯顯祖痛下決心掛冠而去，是不忍礦監稅使對遂昌進行的騷擾。當時神宗疾病纏身，秉性乖張怠於臨政，卻勇於斂財。他斂財不是為國庫開闢財源，而是為增加宮廷小金庫的積累，供自己享樂。因此他不用內閣來執行，而是直接派太監到全國各地充當礦監稅使。自萬曆二十四年(1596)起，礦監稅使所到之處，掠奪商民，一旦被認為地下有礦苗，房屋就要全部拆除，以便開礦。開礦時挖掘不到，附近的商家會被指控“盜礦”，必須繳出全部“盜礦”的賠款。礦監所到之處，民窮財盡，“鞭苔官吏，剽劫行旅，商民恨刺骨”，“其黨直入民家，姦淫婦女，或掠入稅監署中，士民公憤”，而“帝不問”(《明史·食貨志》)成為明代一大惡政。地處浙西南山區的遂昌，礦藏豐富，尤以濂竹的黃岩坑金銀礦全國知名，被載入《宋史》。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礦監曹金到了浙江，瞭解了遂昌礦藏的分佈，“疏報七十三處”準備開採。在京的項應祥得知家鄉要遭開礦劫難，“髮上指冠”，上疏報陳採礦擾民之弊，講得“焦唇裂舌，徒益大內片紙，奈之何”！(〈東馮文所少參〉)湯顯祖身為朝廷命官，曹金是神宗直接派來的礦監，無能抗命。心中憤恨無比的湯顯祖，稱他們為“搜山使者”，



湯顯祖為王鑑月洞的題匾

他們的來到，“地無一以寧，將恐裂之云”。（〈寄吳汝則郡丞〉）他作〈感事〉詩譏諷：

中涓鑿空山河盡，聖主求金日夜勞。
賴是年來稀駿骨，黃金應與築臺高。

詩用戰國時燕昭王“千金市骨”和“黃金臺”兩個典故，說太監要把大明江山鑿空殆盡，皇上為斂財日夜操勞。好在近年來賢才名士太少，不然的話皇上求賢的黃金會堆得比燕昭王的築臺還要高。哪裡是賢才真的缺少，而是神宗祇知一味斂財而不重人材。“中使祇今堆白雪，衰翁幾日試黃芽”（〈戲答無懷周翁宗鎬十首·之四〉），抨擊神宗開礦斂財，是不顧民生安危，祇求萬年統治，矛頭直指神宗。湯顯祖不願自己苦心經營的“有情天下”，讓無情的“搜山使者”所踐踏。他不堪為虎作倂去騷擾百姓，搜刮子民。“上有疾雷，下有崩湍，即不此去，能留幾餘？”（〈答郭明龍〉）這個知縣無法再幹下去了。“世路良艱、吏道殊迫”（〈答山陰王遂東〉），沒有別的選擇，祇有走陶淵明的路。

湯顯祖在京向吏部主持考察官員遞交了遂昌簿籍同時遞了長假單，掛冠回歸臨川。雖然主持考察官員作了挽留，選拔人材授官事務的官員以及掌管彈劾糾察及圖籍秘書官員都作了挽留，但湯顯祖正氣凜然，歸隱決心已下，誰也挽留不了。

出京返程途中，湯顯祖又經過了趙邦清治理的騰縣陽谷店，看到了十年前以南京太常博士身

份北上京察、在此提寫〈陽谷店〉詩，然而詩人十年仕途坎坷之路倏忽而過，陽谷店景色依舊，詩人心境已不同。秉燭夜觀舊作，雖在滿積的塵垢中依稀可辨，但大半人生之路已醒悟“覺今是而昨非”，已“驅車從此去”決意退出官場了，如從窗櫺上透出了曙光，無官一身輕，“勉矣後來人，當知心所語”。

湯顯祖棄官消息傳到了遂昌。遂昌的官吏和百姓派出代表長途跋涉於三月初三日趕到揚州鈔關挽留。那裡是大運河和長江的交界處。湯顯祖回臨川必經此溯長江而上。遂昌吏民找到了湯顯祖停泊的行船，飲泣江關要他回遂昌繼續當他們的父母官。但湯顯祖動情地對他們說，宦宦生涯對我已是一去不復返了，請你們多保重，不用為我的離去而傷心難過了。挽留隊伍中還跟來幾個年青男孩，他們扶着湯顯祖乘坐的船頭捨不得讓開。行船消逝在空闊的雲水間，湯有詩記下這感人的此情此景：

富貴年華逝不還，吏民何用泣江關？
清朝拂綬看行李，稚子牽舟水雲間。

（〈戊戌上巳揚州鈔關別平昌吏民〉）

湯在揚州鈔關和遂昌吏民泣別後，乘船溯長江而上，到句容縣龍潭鎮“回宿”。龍潭是長江南岸出入南京的門戶大碼頭之一，湯兩次赴京上計在此下榻。後進入南京城與時任南京通政參議的李三才告別。為了答謝遂昌吏民的深情厚誼，湯出南京後

沒有再溯長江而上江西，而是從南京回到了遂昌。

到了遂昌，也許家眷早已安排走了，湯隻身未住進縣衙，祇在縣城北郊濟川橋畔的妙智堂小住數日。可以想見，來妙智堂看他的各界人士絡繹不絕。宋代愛國詩人王鑑後人，得知湯已棄官暫回遂昌，趕忙來到妙智堂請求為其家族題寫匾額。王鑑，字介翁，號月洞，是宋代有民族氣節的愛國華僑詩人，由選舉授與臨川相鄰的金溪縣尉，後棄官歸隱，以詩述懷。湯以唐代雲門寺僧人靈澈“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的詩意，書下“林下一人”蒼勁有力四個大字，落款署的時間是“萬曆二十六年三月”，既贊揚王鑑辭官歸隱的高潔之舉，表達惺惺相惜之情。

“歸去之日，士民老幼，依依惜別。”⁽⁸⁾湯下侵雲嶺到溪口，改乘小舟順靈山港而下，蒼茫暮色中，看到岸邊巍然屹立“清獻坊”。“清獻坊”是後人為紀念北宋“鐵面御史”趙抃（諡號為“清獻公”）而建的牌坊。趙公為人剛直不阿，為官勤政愛民，去後英名流芳千古，現在自己帶着無奈與辛酸“罷令”而歸，此時過龍遊，已沒有做“仙令”時那樣幽閒安樂心情了。其中況味，誠如沈際飛評語：“作官之苦可知。”湯顯祖行船出衢江，上衢州抵江山跨入江西境內，然後水陸兼程回到了臨川。

遺愛平昌

棄官歸隱，走陶淵明之路，這是湯顯祖必然的歸宿。懷着“慷慨趨王術”的豪情走上仕途的湯顯祖，並沒有給自己規劃長遠從政，他自信“有區區之略，可以變化天下”，希望在政治舞臺上，作為一番就謝幕退隱。“神州雖大局，數着亦可畢。了此高足謝，別有煙霞質。”早就作了這樣的表白。然而“世路良艱、吏道殊迫”，他的“區區之略”，僅“變化”遂昌，便再無回天之力。一個有政治抱負的才俊而又“狂狷”不拘，視首輔結納“如處女子失身”，畢竟是書生，“彭澤孤舟一賦歸”便是遲早要來到的事。

湯顯祖走了。他帶着深深的感歎和太多的無奈“掛冠”走了。人雖走了，但留下情，遺下愛。他“興教勸農”、“滅虎縱囚”、“剪除害馬”、“借奉著書”，苦心營造的“有情之天下”，澤披遂昌士民。

拋官情繫平昌人。湯顯祖回到臨川後，曾託與遂昌毗鄰的龍泉縣知縣楊開泰（臨川人）捎去他對遂昌士民的思念。凡遂昌士民求他做些文墨之事，他皆熱心完成：萬曆三十五年（1607），後任知縣辜志會組織百姓將遂昌土城重修好，請他作序。他欣然命筆，寫下〈遂昌新作土城碑〉，贊揚了辜築土城對維護遂昌社會治安的作用，表達在任未能構築這一工程的內疚之情；王鑑後裔王叔隆要重刻先祖王鑑〈月洞詩集〉，遠託顯祖作序，他欣然作了〈王鑑月洞詩序〉，表達了對王鑑人品與詩品贊賞敬慕；麗水縣修築了通濟堰，請他作碑文，他下筆千餘言，應命書就。湯和遂昌士民的不凡情誼，連外省人都知道了，福建有個叫藍翰卿的年青人想投拜湯的門下，帶着詩文到遂昌找葉幹，由葉引薦，湯收藍為門生。遂昌讀書人還常有人到臨川向他求教，湯總是悉心解惑，讓來者滿意而歸。

“客來千里見高情”。離任兩年，驚悉湯的長子士蘧在南京不幸早逝，遂昌委派獨山村的葉時陽前去臨川弔唁，對湯進行慰問；湯歸臨川的第十個年頭，遂昌在相圃書院為湯立生祠，特派畫師徐侶雲專程赴臨川為湯繪製絹本肖像，掛在生祠內供人瞻仰，後移至縣城義學。湯深領遂昌士民的深情厚愛：“平昌祀我，我何以祀平昌？”（〈及聞人時君可〉）萬曆三十四年（1606），遂昌葉幹去北京太學（國子監）讀書，也要繞道臨川與湯告別後再北上；兄葉梧從嶺南歸來回遂昌獨山，也繞行到臨川去看望湯後再去遂昌。

“相思時有夢魂驚”。當湯顯祖收到處州知府鄭懷魁作的〈遂昌相圃湯侯生祠記〉，立馬給鄭致信云：“讀至‘行可質天地鬼神’，不覺涕從，何以得此；譽以‘文能安民人社稷’，徒令

汗浹，無所承之。”得知遂昌要將鄭知府的〈相圍生祠畫像記〉刻石立碑以志，湯是“夢魂常發瑞牛光”，“時一看碑到射堂”（〈寄平昌時葉諸生，為護鄭太守碑金石之文也二首〉）。奈何他已年老體衰，未能實現再到遂昌的心願。

遂昌感念湯顯祖。萬曆四十四年（1616）湯逝於臨川，遂昌士民為表彰湯氏政績，在縣衙另立他的位牌，入祀於遂昌名宦祠。康熙九年（1710）“與先生生同鄉，志同道，官同方”的繆之弼（撫州崇仁人）蒞任遂昌知縣。他瞭解到湯當年治遂，“治績日益懋，政教日益彰”，“遂人士今日心焉繫之，口能無之”，但陳放他位牌的射堂“蔓草荒煙”，“瞻拜其像”又要到義學去，他感到雖“未獲親承於一堂”，但他“讀玉茗堂所著”，當“奉以師資”。（〈湯公遺愛祠記事〉）康熙五十一年（1712）冬，繆知縣依眾議集資，在城內報願寺左建構了遺愛祠，並從義學中請出湯公肖像懸於遺愛祠神龕正中，又從名宦祠遷出湯公位牌置於湯公肖像之前，了卻遂昌士民多年想把湯的肖像與牌位歸位的一樁心願。繆還主持建構遺愛祠，面積雖僅為一百平方米的木柱青瓦泥牆平房，可稱最早的湯顯祖紀念堂，每逢朔望之日，繆“必躬詣以肅瞻拜”。為了加強對遺愛祠的管理，繆還置田三十九畝，派有專人收租納糧，管理修繕，負責春秋兩祭事宜。自建祠至民國前，歷任縣官每逢春分秋分兩祭祀日必親率僚屬和縣學生員連同社會名流到遺愛祠頂禮瞻拜，遂成遂昌一大習俗。

處州知府鄭懷魁聽說遂昌為湯顯祖畫像立祠，欣然為之作記，高度評價了湯顯祖在遂昌的政教治績：“行可質天地鬼神，而時逢事拙；文能安民人社稷，則學古功偉。”（〈遂昌相圍湯侯生祠記〉）光緒二十五年（1899），湯的臨川又一位老鄉樂桂榮來遂昌任知縣。他上任後將遺愛祠修繕一新，自己還親撰了一副楹聯，贊揚湯的政績，表達了要像湯顯祖那樣，做個眾口褒揚為平昌留下遺愛的好官：

先後兩臨川，我慚時政疏虞，難媲昔賢褒眾口；
古今同邑宰，公獨名祠巍煥，尚留遺愛結民心。

楹聯用木板鏤刻，鑲嵌於正廳醒目的柱子上。可惜楹聯與肖像均在清末民初兵燹中失落。為不忘湯的遺愛，遂昌士民還將湯治遂期間寫的〈聽說迎春歌〉和迎春口占等詩作譜曲傳唱，至清道光年間還有婦孺能唱者。道光年間的遂昌進士吳世涵作有〈遺愛祠謁玉茗湯公〉云：

臨川一老仰清標，花下芳祠拜寂寥。
賈傅立朝惟痛哭，莊生作吏亦逍遙。
孤臣志業拋荒棘，仙令文章泣鬼魑。
留得山城遺愛在，迎春歲歲入歌謠。

（自註）先生作迎春詩，至今婦孺猶有能歌者。

從隋朝到清朝一千三百多年中，遂昌縣有姓名可查的縣官共有三百一十五人，唯有湯顯祖一直受到遂昌百姓如此深切的懷念。“功名即真，猶是夢影”（〈答李宗誠〉）——湯顯祖長留遺愛在人間！

（2011年11月1日脫稿於勝景樓）

【註】

- (1) (3) 見屠隆詩〈春日登尊經閣〉，乾隆《遂昌縣志》卷十一。
- (2) 見屠隆詩〈啟明樓〉，光緒《遂昌縣志》卷一。
- (4) 轉引蔡毅《中國古典戲曲序跋彙編》（第一冊），山東齊魯書社，1989年。
- (5) (6) 屠隆〈玉茗堂文集序〉，《湯顯祖詩文集·附錄》。
- (7) 屠隆在〈與丁右武〉信中說：“去秋發吳門急走錢塘，溯嚴灘，將直抵浩洪都，與仁兄一握手泣別。行至蘭陰，晤趙符卿年兄，知右武業泛九江道皖城而北矣。慟哭岐路，躊躇何之，乃訪湯義仍遂昌，問兄消息。”（《鴻苞集》卷四十四）。又在〈與鄧汝德少參〉信中說：“徘徊岐路，計無復之，乃往括蒼訪湯義仍。義仍使至自南昌，始悉右武消息，尋以民掛黨籍。老母憂念，家奴來促歸，匆匆東下。”（《鴻苞集》卷四十）
- (8) 轉引自王德兵〈湯顯祖遂昌詩文敘論〉，《綿陽師範學院學報》第23卷第6期，2009年6月。